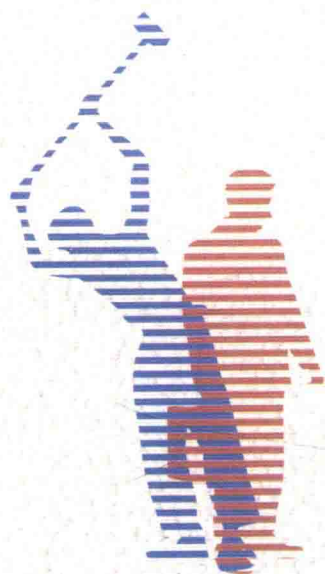


经世学人文丛

GREAT CHANGES

Migrant Workers and Middle Class



大变革

农民工和中产阶级

李培林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版

| 经世学人文丛 |



大变革

农民工和中产阶级

李培林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变革：农民工和中产阶级 / 李培林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2

(经世学人文丛)

ISBN 978 - 7 - 5203 - 3980 - 3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民工—研究—中国②中等资产阶级—研究—
中国 IV. ①D669. 2②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0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李凯凯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把这本书取名为“大变革：农民工和中产阶级”，因为在中国，农民工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仅是工业化、城镇化巨大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深刻的体制大变革的产物。

这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加之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规模，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现在，农民工和中产阶级这两个群体加起来，从业人口达到6亿人，了解了这两个群体，就了解了近半个中国。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1978年中国9.6亿总人口中，有7.9亿农民，占82%。1988年我刚回国时，把法国社会学家H. 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La Fin des Paysans*）一书翻译成中文，受到学界关注，但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中，中国有数

2 前 言

以亿计的传统小农，通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转变为现代工人，支撑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起初，人们对中国的“民工潮”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极大担忧，毕竟这种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进入城市，通常总是与犯罪、贫民窟、社会排斥、文化冲突、骚乱、抗争等话题相联系，但中国农民工意外地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和未预期的社会融入能力，受到普遍社会赞誉。

我曾在主编的《农民工》一书中写道：“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火车站里，他们身背铺盖卷茫然地环视；城市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忙碌地搭建脚手架；劳动密集的工业流水线上，他们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货运的码头上，他们紧张地搬运沉重的物品；大街小巷中，他们回收着生活的废品；千万个家庭里，她们照料着城市的孩子；夜晚的地铁里，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并面对着投来的异样目光……但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却构成一个伟大社会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勇于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日常精神，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产阶层的成长是理解中国巨变的另一个窗口。在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人数寥寥，现在已经发展到约3亿人，相当于半个欧洲的人口或美国

的人口。由于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中国的国内消费已经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2/3的推动力量。中国能否成功化解可能的危机、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决定着中产阶级未来的成长。而中产阶层的成长，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和社会面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中产阶级成长，是中国今后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未来发展中，“农民工”可能与“乡镇企业”一样，成为一个过渡性概念，他们终将成为“新市民”，继续推动中国的巨变；而“中产阶级”，不管围绕这个概念有多少争议，他们也将在中国正在展开的创新发展中成长为中坚力量。



2018年12月5日

目 录

前 言	李培林 (1)
-----------	---------

上篇 农民工

第一章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	李培林 (3)
第二章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李培林 (21)
第三章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李培林 李 炜 (63)
第四章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李培林 李 炜 (88)
第五章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李培林 田 丰 (119)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李培林 田 丰 (156)

下篇 中产阶级

- 第七章 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 李培林 (201)
- 第八章 中产阶级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李培林 (231)
- 第九章 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 李培林 朱 迪 (264)
- 第十章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 李培林 张 翼 (307)
- 第十一章 建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 李培林 张 翼 (337)
- 第十二章 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和特征
..... 李培林 朱 迪 (367)

上篇 农民工

第一章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农民工 流动的治理经验

李培林

摘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民工从无到有，形成数以亿计的人群，从农业向工商业、从乡村向城镇、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本章梳理和总结了农民工流动的发展过程、相关研究、舆论变化和治理经验，尝试把农民工流动提炼为移民治理成功经验的经典案例。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改革开放、社会治理

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移民的一种类型。移民研究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解决劳

4 上篇 农民工

动力缺乏问题，引入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曾是普遍的做法。但大量的外来移民，由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融入难、民族宗教冲突、犯罪率升高、排外情绪高涨、恐怖袭击威胁等。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和社会治理中，移民的社会融入始终是一个难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黑人移民问题、墨西哥移民问题，至今仍然是很多政治对立、社会分裂和群体抗争事件的导火索。欧洲的新移民问题正成为欧洲各国大选中“选边站”的焦点问题，甚至一些在欧洲国家出生的阿拉伯裔的第二代移民，仍然因为难以融入西方社会而成为社会骚乱的动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为经济快速增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的城镇化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标志性过程。现在，我国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已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总量的增长开始放缓，预计未来5年内会出现农民工总量增长的停滞。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我国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它必将成为世界移民史上社会融合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 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发展进程和舆论评价变化

中国农民工流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数以亿计）在短时期内从农业向工商业、从乡村向城镇、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农民工流动虽然是国内的流动，但在我国与城市人口也存在户籍、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地位、思想观念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也有一些共性。

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被誉为中国式的独特城市化道路。1984年，为了加强城市的副食品供给，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其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从此拉开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1985—1990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数还只有约335万人，而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2286万人，乡镇企业仍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渠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农民工流动方式的转折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逐步超过了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人数，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李培林，1996）。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1.72亿人。

农民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是紧密相连的。“民工潮”的兴起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春节返乡时火车站拥挤人海的震撼画面，也曾在很多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热播。

然而，国内外舆论在看待中国农民工问题上经历过根本性转向。中国的“民工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疑和非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雇用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血汗工厂”，中国是用血汗工人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成为“世界工厂”；一些西方媒体甚至断言，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必定会成为强大的“颠覆性”社会力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虐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又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甚至预言：“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王山，1994：26，62-63）^①

^① 1994年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经过精心“策划”、由王山撰写的，出版时作者托名莫须有的所谓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洛伊宁格尔”，还写上“王山译”，一时在全国影响很大，震惊京城，甚至引起国家领导人注意，但冒名之事很快被人识破，著名作家王蒙也撰文说德国汉学界从未听说“洛伊宁格尔”其人。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虽然也存在农民工生活条件和待遇较差、社会保障欠缺、欠薪问题一度比较严重以及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现象等问题，甚至出现过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的“富士康事件”，但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还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这与 1997 年到 2002 年国有企业“减人增效”改革中频繁出现的下岗失业职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形成鲜明对比。

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舆论对农民工流动的看法出现转折性变化，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也开始把农民工塑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脊梁。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 2009 年，农民工的群体形象作为年度人物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步带领全球走出危机阴影，这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

我国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变化，这些研究始终伴随着农民工的成长和发展。

二 我对农民工的研究和关注

移民研究一直是国际社会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许多经典著作都是研究移民的，如《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18—1920）、《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

民区的社会结构》(1943)等。这些著作都体现了深入的社会调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底层视角。我国社会学界对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史国衡教授的《昆厂劳工》,就是对农民工适应工厂生活的经典研究,他探索了中国农民工不同于西方由破产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模式,并把人的转变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史国衡,1946)^①。

但“农民工”这个词的提出,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据陆学艺教授的考证,“农民工”一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已故的张雨林研究员首先提出的,1983年他在《社会学通讯》(《社会学研究》的前身)上发表了一篇以“县乡镇的农民工”为题的文章,专门研究在苏南乡镇企业打工的当地农民(陆学艺,2003)。

我的研究兴趣在工业社会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蔡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城市吸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和对策”课题,到我的出生地山东济南进行进城农民工调查,那可能是国内早期少有的进城农民工抽样调查,因为那时一般很难找到进城农民工抽样调查的样本框,我们也是在调查中偶然发现了公安部门的农民工临时登记簿。我基于这次调查

^① 《昆厂劳工》是魁星阁社区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把社区研究延伸到企业,此书最早由费孝通去美国访学时译成英文,于1943年以《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为书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美国管理学家、人际关系学派创始人梅奥教授为该书写了按语,该书中文版1946年才冠名《昆厂劳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数据的分析，1996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该文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角度分析农民进城打工这种经济学中称为劳动力流动（labour migration）的现象，即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视为农民获得新的经济社会地位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就像当初农民进入乡镇企业时把亲缘、地缘传统网络移植到企业中一样，现在又把这一网络移植到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这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却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李培林，1996）。

2002年3月，受爱德基金会的资助，我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以“农民工流动：现状、趋势和对策”为题的研讨会，汇集了一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知名学者撰文和研讨，如白南生、蔡昉、崔传义、李强、孙立平、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周大明、刘世定、王春光、王晓毅、关信平、刘精明等。会议的论文集以“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为题出版，一时热销。我在该书“编后记”里写道：“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他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却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勇于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日常精神，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李培林主编，2003：294-295）

我对农民工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转变了职业，更